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2.02.004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

——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周丹¹,李五荣¹,方劲平²

(1.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2.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关键词: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农民工;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F241;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2)02-0047-16

* 收稿日期:2021-12-22;修回日期:2022-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JL014);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DCX2020B016)

作者简介:周丹(1992),女,湖南永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民工流动研究;E-mail:20193100035@smail.xtu.edu.cn。李五荣(1966),男,湖南益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E-mail:wwlehn@126.com。方劲平(1994),男,安徽黄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E-mail:fjp841031@163.com。

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各经济主体、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不容忽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路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也为中国城市建设和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60%,农民工进城务工依旧是大势所趋,然而农民工的就业实现及质量提升依然存在诸多障碍。《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不断增长,然而大多数农民工仍集中在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存在工作强度大、缺乏相应的权益保障及就业不稳定等问题,就业质量相对较低。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不仅有利于推动其所在城市、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可以显著改善农民工家庭的生活质量、提升其自身幸福感,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徐灏龙等,2021)^[1],同时还能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进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持续提升。

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家庭条件及社会经济环境三个层面展开。从个体特征层面看,除了性别、年龄等先天决定的因素外,个体能力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早期的研究更多地从受教育程度、劳动技术水平等认知能力的角度探讨个体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但即使是受教育水平相似的劳动者也可能在语言表达、思维创造能力、做事严谨性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社会化生产背景下,这些非认知能力也是影响个体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工作复杂程度和工作差异程度的提高,个体认知能力对其就业和收入的解释力有所下降,而非认知能力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越来越突出(Heckman et al, 2006; 李晓曼等, 2019)^[2-3]。在此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之间的关系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非认知能力”是指除学习、阅读、计算和逻辑推理等认知能力外,但同样对个体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及生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性格心理因素,如情绪、心态及个性等,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概念。“就业质量”也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用于反映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情况,是对劳动者就业状况的总体性刻画,既包括劳动者在就业活动中的物质获得,也包括劳动者个体的主观感受。关于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的关系,大量的研究是从非认知能力的某个维度(如社交能力)或就业质量的某个方面(如工资收入)展开的(程虹等,2017;乐君杰等,2017;王春超等,2019;陈博欧等,2021;朱志胜,2021)^[4-8],而专门研究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文献还不多见。其中,梁宇亮等(2021)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9],但其仅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层面进行研究,忽略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仅采用了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对现状的解释力不足,且可能因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估计偏误。

纵观已有相关文献,大多研究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状况的影响,缺乏对就业质量的综合性考量,而且关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儿童、特定行业或性别层面,对农民工的探讨相对较少。事实上,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而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机理,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

一是尝试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对农民工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关系的影响。相比主要由个体知识和技能决定的认知能力,主要由个体心理和性格决定的非认知能力的运用及其作用发挥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然而,目前关于外部环境影响个体非认知能力作用发挥的研究较少,且少量的文献集中于心理学领域。基于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进入非农业是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最为显著的特性,本文认为城市社会包容度不但会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可以正向调节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并对此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

二是尝试从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的角度,探讨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与就业质量三者间关系因工作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出的差异性。除了就业环境,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也可能影响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发挥。一般来讲,工作的复杂度及外向性越高,对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要求越高,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越大,社会环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也越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作为个体工作表现和技术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交互影响的视角探究个体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的关系。Heckman(2011)、程虹和李唐(2017)等认为,非认知能力不仅是一种心理特质,也是个体进行人力资本和工作积累的重要技能因素;个体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有效积累自身的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又会促进其受教育程度、技能经验等认知能力的提高,因此,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的相互促进带来个体综合素质和能力的不断提高,并最终对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10][4]}。二是基于激励强化理论,将劳动者的非认知能力作为经济模型的内生因素,分析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比如: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员工努力程度更高,更容易全身心投入工作并获取雇主信任,呈现出就业竞争优势,雇佣此类员工有利于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组织整体运作效率;因此,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更愿意雇佣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劳动者,并为其提供更高的薪酬,进而提升其就业质量^[5]。梁宇亮等(2021)的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不仅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间接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9]。三是从职业、性别等角度分析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影响就业质量的异质性。Sarah(2011)认为,对于不同职业或行业的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不尽相同^[11]。盛卫燕和胡秋阳(2019)指出,高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需要具备一定的人际交往、反应能力和生活经验等,因而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12]。Costa等(2001)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远高于男性^[13];但梁宇亮等(2021)认为,相比女性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9]。综上所述,相关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大多认同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对其就业质量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城市社会包容度是指城市在消除人们融入融合过程中遇到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障碍的程度。社会质量理论认为,城市社会包容度既包括社会成员对其权利保障和福祉的满意程度以及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也包括城市外来人口落户政策、公共服务水平和对社会成员的包容程度(WALKER, 2009;卢小君等,2018)^[14-15]。城市社会包容度作为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聂伟,2018)^[16],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城市层面来看,城市完善的劳动市场和劳工保护制度既可以提高劳动回报率又可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而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积极影响(王建国等,2015)^[17]。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民工在就业中的障碍比城市本地劳动者往往更多。例如,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公共服务与工作机会上更容易受到歧视,就业稳定性也会降低(Combes et al, 2013)^[18]。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会大大减少这些障碍。此外,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需要就业支撑,也需要城市公共服务保障,流入地城市包容度的提高将增强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因此,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的社会包容度越高,外来的农民工越容易融入其中,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质量也越高(李叶妍等,2017)^[19]。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农民工务工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

3. 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调节作用

个体能力对其就业状态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能力的强弱,还会受到就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发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由于农民工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外来者”,其在农村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非认知能力能否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发挥作用以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从城市的社会包容性来讲,社会包容度较高的城市会让农民工更容易地融入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加快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城市化转型,并有利于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在其就业活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从农民工的主观感受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可能遭受来自城市社会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偏见,消极焦虑的农民工容易衍生负面的情绪和心理问题,进而对其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如果城市社会是包容的,则会大大减轻农民工的负面情绪,提高其自信心,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掘自身潜能。此外,相比于城市本地人和未外出农民,农民工通常需要承受远离亲人的孤独感、不能融入城市的疏离感以及较低自我认同感。当所在城市的社会包容度较高时,农民工的社会疏离感较低,往往具有更为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情绪,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进而提高其就业质量(何晓丽等,2011)^[20]。另一方面,从城市公共服务的客观效应来看,社会包容度较高的城市会给农民工提供较为公平的就业机会、更为完善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城市的社会包容度越高,城市为农民工提供福祉的公平性越高,同时也会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制度上、物质上的就业资源,不但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动力,而且也为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给予了更多保障(聂伟等,2021)^[21]。比如,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者保护制度的完善等,既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回报率又可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而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可以强化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

4. 时间趋势与行业异质性

除了就业环境,劳动者所从事工作的特性也可能影响其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发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一方面,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导致劳动者的工作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同时不同工作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会使完成(做好)一项工作对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在整体上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但由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社会的多元化等也可能带来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在个体上的差距加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产业链现代化快速推进,农民工的务工活动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与此同时,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持续提升,非认知能力及城市社会适应力不断增强。此外,随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城市的社会包容度也显著提高。但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劳动者个体之间、城市之间的差距。因而,从时间维度看,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加、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增强、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在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中的调节作用均会呈现增强趋势。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4: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强,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也趋于强化。

再从行业异质性来看,不同行业的工作特性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对于不同行业或职业的劳动者,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Sarah,2011;Nypvist et al,2013)^{[11][22]}。总体上看,农民工多聚集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中。农民工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更多的是

从事体力劳动,但在制造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相对较高,而在服务业就业需要劳动者具备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反应能力和生活经验等,这类隐性能力可以丰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其就业质量(盛卫燕等,2019)^[12]。此外,相比于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接触城市社会的空间和空间更大,使得其可以更多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一方面使其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发挥会更多地受到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影响(Walker et al,2004)^[23],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其非认知能力的城市化转型和提升。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5:对于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依次增强。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模型构建

为考察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 OLS 模型(1):

$$employ_{it} = \alpha_0 + \alpha_1 non_cognitive_{it} + \gamm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employ_{it}$ 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核心解释变量 $non_cognitive_{it}$ 为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 X_{it}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流动范围”以及职业固定效应^①、行业固定效应^②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若系数 α_1 显著为正,表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升。

为考察农民工所在城市的包容度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社会包容度在非认知能力影响就业质量中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模型(2):

$$employ_{it} = \beta_0 + \beta_1 non_cognitive_{it} + \beta_2 usi_{it} + \beta_3 non_cognitive_{it} \times usi_{it} + \gamm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usi_{it} 为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社会包容度”, $non_cognitive_{it} \times usi_{it}$ 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交互项。若系数 β_1 、 β_2 和 β_3 均显著为正,表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可以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会强化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其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

2. 变量测度

(1)“就业质量”。就业质量既包括与劳动者就业活动有关的客观状态,也包括劳动者自身的主观感受。对于就业质量的测度,早期的研究多以客观性指标为主,将就业质量归为宏观经济指标(Bastelaer et al,2003)^[24]。随着劳动力调查资料的日益丰富,通过个体主观感受对就业质量进行测量逐渐受到重视,例如,钱芳等(2013)将工作满意度纳入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25],聂伟(2019)将就业质量分为工作

① 本文设置的职业虚拟变量未考虑“军人”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将样本的职业分为6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② 本文按照 CFPS 中的行业分类设置行业虚拟变量,共20个行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其他行业”。

特征、工资收入、工作权益保障、职业发展和主观职业地位 5 个维度^[26],张原(2020)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职业声望评估^[27]。本文借鉴苏丽锋(2013)、Leschke 和 Watt(2014)、明娟和王明亮(2016)、梁宇亮等(2021)的做法^{[28-30][9]},并结合样本的数据特征(CFPS 数据库),从劳动报酬、工作权益保障、职业发展、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技能 5 个维度来评价样本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见表 1)。由于所选指标的相对重要性难以衡量,因而先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①,再采用算术平均加权法计算样本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表 1 就业质量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值方法
劳动报酬	工资性收入	月收入
	每周工作时间	每周工作小时数
权益保障	医疗保险参保	参保取值为 1,未参保取值为 0
	养老保险参保	参保取值为 1,未参保取值为 0
	劳动合同签订	签订取值为 1,未签订取值为 0
	加入工会情况	加入取值为 1,未加入取值为 0
职业发展	对前途的信心	根据信心程度由低到高取值 1~5
	在处事方面与他人相比	根据程度由差到好取值 1~5
工作满意度	对工作收入、工作环境和工作安全性的满意度	根据满意程度由低到高取值 1~5
工作技能	是否参加培训	参加取值为 1,未参加取值为 0
	是否从事专业技术型工作	专业技术型人员取值为 1,其他取值为 0

(2)“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具有多维性特征,本文选取应用最广的“大五人格量表”对其进行测算。人们的人格特质并不是完全不可观测的,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进行归纳总结,学界通常将表述个性特征的微观词汇分为五大类,即严谨性、宜人性、外向性、神经质和开放性。严谨性指个体尽责、自律、行事从容严谨等的程度,宜人性指个体随和、信任他人、宽容等的程度,外向性指个体的交际能力和热心程度,神经质指个体的抗压程度,开放性指个体的思维创造能力和好奇心程度(Costa et al, 1992)^[31]。其中,神经质越强,孤独感越强,越容易表现出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因此该指标在相关研究中多为负向指标。常用的非认知能力测量方法有 3 种:自评报告(Mueller et al, 2006; Borghans, 2008)、他人评价(Segal, 2008)和行为表现推断(Heckman, 2001)^[32-35]。本文采用自评报告来衡量样本的非认知能力。借鉴李涛和张文韬(2015)、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的研究^{[36][6]},根据“大五人格量表”构建五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为便于比较,将 CFPS 的对应题项统一为 1~4 分度^②,并将负向指标调整为正向指标,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加权平均得到非认知能力各维度的评价值和总指数。

(3)“社会包容度”。参考卢小君和韩愈(2018)、聂伟(2018)、徐延辉和李志滨(2019)等的方法^{[15-16][37]},本文采用样本个体层面的主观性指标和城市层面的客观性指标来综合评价城市社会包容度(见表 3)。先将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在 $[0, 1]$ 之间,然后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最后计算得到城市社会包容度指数。

(4)控制变量。农民工就业质量会受到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的

① 正向指标: $X_{in}^{nor} = [(X_{in} - X_n^{min}) / (X_n^{max} - X_n^{min})]$; 负向指标: $X_{in}^{nor} = [(X_n^{max} - X_{in}) / (X_n^{max} - X_n^{min})]$ 。

② 例如:CFPS 数据库中“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人缘有多好”等题项有 10 个分度,将其调整为“非常不信任(非常不好)”“不信任(不好)”“信任(好)”“非常信任(非常好)”4 个分度。

影响,并且农民工的流动范围、职业和行业也会对农民工融入城市产生显著影响。参考黄国英和谢宇(2017)、邓睿(2020)等的研究^[38-39],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年龄”,考虑到年龄对就业质量可能具有非线性影响,同时加入“年龄平方项”;二是“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三是“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在婚、同居者赋值为1,未婚、离婚和丧偶者赋值为0;四是“受教育年限”,为样本已完成的受教育年限(0~23年);五是“健康状况”,由不健康到健康分为5个分度,数值越大,身体越健康;六是“流动范围”,为虚拟变量,跨省流动者赋值为1,本省流动者赋值为0。此外,本文模型还控制了职业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表2 非认知能力评价指标

维度	CFPS中对应的题项
严谨性	我在做事时可以集中精力的频率(1~4,几乎没有—大多时候有)
	自己不比别人差(1~4,几乎没有—大多时候有)
宜人性	我觉得人们对我不友好(1~4,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我觉得别人不喜欢我(1~4,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1~4,非常不信任—非常信任)
外向性	人缘有多好(1~4,非常不好—非常好)
	受访者的待人接物水平(1~4,很差—很好)
神经质	做事费力(1~4,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我认为生活没有意义(1~4,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我感到精神紧张的频率(1~4,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我觉得心情沮丧(1~4,大多时候有—几乎没有)
开放性	受访者对调查的兴趣(1~4,很低—很高)
	使用互联网络社交对我的重要性(1~4,很不重要—很重要)

表3 社会包容度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测量指标	
个体层面	歧视感知	因户籍、性别受过歧视
	社交感知	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
		是否参加任何组织
		他人的友好程度
群体差距感知	自身与别人的比较	
城市层面		外来人口人均购房数量
	城市落户门槛	城镇人才引进状况(对学历与职称进行加权累加)
		城镇登记失业率
		人均医院、卫生院数量
	城市公共服务	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政府办事效率

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FPS)。该调查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就业的变迁。借鉴明娟和王明亮(2016)、卢海阳等(2017)的做法^{[30][40]},本文将“农民工”定义为户籍仍在农村、年龄在16~64岁、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同时剔除自雇、目前无工作和重要变量缺失的无效样本,最终从个CFPS数据库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26 643个农民工样本,样本期从2010年至2018年,共五次调查,其中2010、2012、2014、2016、2018年的样本量分别为4 855、5 101、5 806、5 412、5 469个。此外,在测量城市“社会包容度”中,使用了张吉鹏和卢冲(2019)构建的“中国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和国泰安区域经济数据库的城市公共服务相关指标^[4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虽然样本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非认知能力”普遍偏低,但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城市“社会包容度”在五期样本中均大于0.5,且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样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多处于初中学历水平,并以省内流动居多。

表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就业质量	0.101	0.063	0.184	0.075	0.270	0.072	0.287	0.084	0.311	0.081
非认知能力	0.181	0.251	0.129	0.025	0.251	0.135	0.364	0.124	0.359	0.066
社会包容度	0.666	0.077	0.685	0.060	0.706	0.088	0.708	0.089	0.709	0.094
年龄	31.696	9.773	31.765	9.998	32.695	9.733	32.949	10.073	37.432	11.577
性别	0.604	0.489	0.689	0.463	0.574	0.495	0.622	0.485	0.573	0.495
婚姻状况	0.764	0.425	0.627	0.484	0.770	0.421	0.590	0.492	0.752	0.432
健康状况	3.399	1.149	3.608	1.074	3.282	1.144	3.255	1.174	3.395	1.07
受教育年限	8.587	3.726	9.290	3.568	8.884	3.748	10.156	3.619	9.212	4.018
流动范围	0.392	0.471	0.398	0.490	0.396	0.489	0.460	0.499	0.429	0.495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表5汇报了模型(1)的全样本分析结果。第(1)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纳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固定效应,第(3)列则是分析非认知能力的5个维度对就业质量的影响。“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带来显著的“能力溢价”(朱志胜,2021)^[8],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升,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从非认知能力的分维度来看,农民工严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的提高以及神经质的改善均会显著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但宜人性的提高不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现有相关研究也发现宜人性对于劳动力就业具有负向作用(Nandi et al,2014)^[42],其原因在于过于顺从随和的个性不利于农民工在快速变迁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更好的就业选择。

从控制变量来看:(1)“年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民工的年龄与其就业质量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其拐点为45.86,即在46岁以前,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在46岁以后其就业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年龄大的农民工相比年龄小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其就业能力也越强;但年龄的增大也会带来体力和精力的下降,进而影响其就业质量。(2)“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男性、身体健康、学历较高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较高,这与通常的认知相一致。(3)“婚姻状况”和“流动范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比已婚和跨省务工的农民工,未婚和在本省务工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上较高。

表5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变 量	(1)	(2)	(3)
非认知能力	0.174*** (0.005)	0.089*** (0.010)	
严谨性			0.039*** (0.011)
宜人性			-0.097*** (0.010)
外向性			0.011* (0.007)
神经质			0.103*** (0.011)
开放性			0.027*** (0.006)
年龄		1.284*** (0.001)	1.0432*** (0.020)
年龄平方项		-0.014*** (0.001)	-0.012*** (0.001)
性别		0.006** (0.002)	0.006** (0.002)
婚姻状况		-0.011*** (0.003)	-0.011*** (0.003)
健康状况		0.004*** (0.001)	0.005*** (0.001)
受教育年限		0.006*** (0.003)	0.007*** (0.001)
流动范围		-0.011*** (0.002)	-0.008*** (0.002)
常数项	0.195*** (0.007)	0.051** (0.023)	0.073*** (0.025)
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6 643	26 643	26 643
Adjusted-R ²	0.407	0.572	0.565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聚类到个体层面),下表同。

2. 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调节作用

表6为模型(2)的全样本回归结果。第(1)列检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就业质量的调节效应,第(2)至(6)列分别检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严谨性、宜人性、外向性、神经性和开放性影响就业质量的调节效应。“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同样均显著为正;除了第(3)列(检验宜人性的调节效应)外,“社会包容度”及其与“非认知能力”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农民工所在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会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并能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假设H2和H3得到验证。同时,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均能正向影响严谨性、外向性、神经质和开放性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表明责任心、社交能力、抗压力 and 开放精神较强的农民工在社会包容较高的城市里能够更好地发挥其非认知能力优势,进而可以更好地实现较高质量的就业。而对于宜人性较强的农民工,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其就业质量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农民工的顺从、友善不利于其工资的提高,进而对就业质量产生负向影响(Nordman et al, 2018)^[43]。

3. 时间趋势与行业异质性

为进一步探究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动态特征,本文分别对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5期的子样本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见表7。“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在5期子样本中均显著为正,与前文的全样本分析

结果一致。进一步从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且城市社会包容度在非认知能力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也持续增强,研究假说 H4 得到验证。

表 6 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变 量	(1)	(2)	(3)	(4)	(5)	(6)
非认知能力	0.278*** (0.021)	0.211*** (0.010)	0.253*** (0.009)	0.047*** (0.008)	0.091*** (0.018)	0.085*** (0.012)
社会包容度	0.193*** (0.048)	0.032*** (0.012)	-0.216 (0.114)	0.023** (0.015)	0.165*** (0.014)	0.033** (0.013)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	0.462*** (0.111)					
严谨性×社会包容度		0.216*** (0.012)				
宜人性×社会包容度			-0.179** (0.010)			
外向性×社会包容度				0.085*** (0.015)		
神经质×社会包容度					0.165*** (0.015)	
开放性×社会包容度						0.160*** (0.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39*** (0.057)	0.040* (0.024)	0.050*** (0.024)	0.101*** (0.026)	0.041* (0.024)	0.051** (0.024)
样本量	26 643	26 643	26 643	26 643	26 643	26 643
Adjusted-R ²	0.510	0.584	0.577	0.568	0.580	0.577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标准并结合 CFPS 数据库的调查资料,本文选择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行业异质性分析(见表 8)。分析显示:“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在建筑业子样本中为正但不显著,在制造业子样本中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服务业子样本中则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在建筑业子样本中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子样本中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服务业子样本的估计系数值明显大于制造业子样本;“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在建筑业子样本中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子样本中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服务业子样本的估计系数值大于制造业子样本。综上所述,总体上看,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中依次增强,研究假说 H5 得到验证。

表 7 5 期子样本分析结果

变 量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非认知能力	0.043 ^{***} (0.022)	0.094 ^{***} (0.028)	0.115 ^{***} (0.024)	0.278 ^{***} (0.035)	0.376 ^{***} (0.135)
城市社会包容度	0.058 [*] (0.033)	0.087 ^{***} (0.020)	0.099 ^{***} (0.019)	0.206 ^{**} (0.121)	0.210 ^{***} (0.147)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	0.062 ^{**} (0.024)	0.162 ^{***} (0.034)	0.211 ^{***} (0.020)	0.423 ^{***} (0.056)	0.554 ^{***} (0.3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31 ^{***} (0.032)	0.090 ^{***} (0.036)	0.053 ^{**} (0.025)	-0.033 ^{**} (0.102)	0.264 ^{***} (0.049)
样本量	4 855	5 101	5 806	5 412	5 469
Adjusted-R ²	0.546	0.534	0.504	0.469	0.294

表 8 分行业分析结果

变 量	建筑业	制造业	服务业
非认知能力	0.003(0.020)	0.226 [*] (0.060)	0.186 ^{***} (0.017)
社会包容度	0.052 [*] (0.029)	0.023 ^{**} (0.023)	0.057 ^{**} (0.023)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	0.182 [*] (0.102)	0.389 ^{***} (0.081)	0.433 ^{***} (0.09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Cragg-Donald Wald F	76.30 ^{***}	88.57 ^{***}	79.56 ^{***}
样本量	5 080	8 950	11 134
R ²	0.357	0.331	0.507

4. 稳健性检验

(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不同类型的企业会根据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雇佣不同非认知能力的农民工,农民工也会根据自身的非认知能力主动寻求合适的工作和更高的就业质量,由此可能产生自选择带来的估计偏差。倾向得分匹配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选择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采取该方法对农民工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梁宇亮(2021)等的方法^[9],将非认知能力大于均值的样本作为处理组,小于均值的样本作为对照组,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根据“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流动范围”等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估算出倾向得分,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结果显示(见表 9),处理组的就业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本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2) 工具变量法

虽然本文采用 5 期的面板数据可以消除一定的遗漏变量偏误,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及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问题。一方面,存在一些不可观测或难以测量的影响因素,例如认知能力、天生的性格特征

及父母投资等不仅对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也会同时影响就业质量(Kautz et al,2014)^[44]。另一方面,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而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取工具变量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程虹和李唐(2017)等的方法^[4],选取“省内平均非认知能力”(省内农业户口样本非认知能力的平均水平)作为“非认知能力”的工具变量。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劳动力的平均非认知能力较强,则该地区个体的非认知能力也会相应较强,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该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假设;同时,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很难对整个地区的平均非认知能力产生大的影响,从而该工具变量也满足外生性条件。估计结果显示(见表10):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F值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非认知能力”及其与“社会包容度”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

表9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匹配方法	结果变量	处理组	对照组	ATT	标准误	t值
一对一近邻匹配	就业质量	0.175	0.150	0.025	0.005	5.19
半径匹配	就业质量	0.184	0.156	0.028	0.004	5.68

表10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非认知能力		0.082***(0.018)		0.453***(0.042)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		0.134***(0.018)		0.281***(0.052)
省内平均非认知能力	0.932***(0.002)		0.068**(0.036)	
省内平均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	0.097***(0.002)		1.465***(0.010)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45***(0.002)	0.010***(0.001)	0.004(0.018)	-0.007(0.053)
Cragg-Donald Wald F		60.898***		73.62***

(3)GMM估计与样本筛选

在样本时间跨度较短的情况下,直接使用OLS估计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偏差,而差分GMM和系统GMM是两种可以较好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本文利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11),AR(2)和Sargan检验概率值均大于0.1,说明两种GMM方法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此外,为进一步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只保留5期均参与调查的农民工样本(9594个)进行OLS估计和2SLS估计(见表11)。检验结果显示,“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但其就业质量总体上相对较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以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的面板数据,本文在测度“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基础上,对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

质量的影响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均会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且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可以增强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这3种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正向效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在工作复杂度的提高不断增强,表现为日益强化的时间趋势和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中依次增强的行业异质性。因此,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提高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表 11 GMM 估计和样本筛选检验结果

变 量	GMM 估计		只保留 5 期均参与调查的样本	
	DIF-GMM	SYS-GMM	OLS	2SLS
非认知能力	0.116 ^{***} (0.043)	0.113 ^{***} (0.031)	0.175 ^{***} (0.005)	0.461 ^{***} (0.009)
社会包容度	0.076 ^{**} (0.037)	0.054 [*] (0.032)	0.050 ^{**} (0.027)	0.043 ^{**} (0.020)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	1.402 ^{***} (0.500)	1.221 ^{***} (0.422)	0.250 ^{***} (0.036)	0.658 ^{***} (1.6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R(2)	0.756	0.448		
Sargan	0.433	0.519		
Cragg-Donald Wald F				34.140 ^{***}
R ²			0.494	0.407

个体的非认知能力不仅与其认知能力紧密相关,而且受到其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教育资源和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也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因此,提升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不仅需要农民工个体的努力和农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要多措并举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尤其应重视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目前,农村儿童教育更注重认知能力的培养,对毅力、责任心、自尊心等非认知能力的开发不足。儿时非认知能力的培养缺失会对成年后非认知能力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公共教育部门应在课程设计、师资配置、资金支持等方面加强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减轻和消除农民工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时非认知能力的不适应性。与认知能力有普遍的适应性不同,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往往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农民工从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若农村与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过大,将不利于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在其就业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现代化,不断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方式,切实加快各领域的城乡融合。

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体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增强社会包容性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农民工来讲,城市社会包容度的提高需要地方政府、城市居民和用工企业等共同努力。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工作开展中应重视对农民工的赋权,降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落户门槛,制定相关公共服务政策,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从而提高其就业质量。城市居民应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积极营造平等和睦的社区氛围和生活环境。用人单位在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时,应根据农民工就业岗位进行有针对性的非认知能力培训,将“扶智”和“扶志”有效地结合起来;同时,用人单位在招聘农民工时可对其进行性格、模拟行为等非认知能力测试,以便提高农民工就业岗位与其非认知能力的匹配度。此外,由于责任心、严谨度、乐观性

等非认知能力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课堂学习,更需要在工作中进行锤炼。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发展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为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提供政策优惠和资源保障,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方式促进农民工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协同提升,进而提高农民工的整体就业质量。

本文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个体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和农民工就业质量三者关系的认识,但在分析的视角和细致性上仍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是本文仅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分析就业环境的影响,今后可从就业环境的其他方面展开相关研究;二是本文主要对个体非认知能力、城市社会包容度和农民工就业质量三个综合变量进行分析,后续研究可基于各综合变量的分维度进行细化;三是本文只基于工作特性分析了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其他方面的异质性(如性别、受教育水平、工作地点以及家庭和城市层面的变量)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徐灏龙,陆铭. 求解中国农业困局:国际视野中的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竞争力[J]. 学术月刊,2021(6):58-71.
- [2] HECKMAN J,STIXRUD J,URZUA S.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06(3):411-482.
- [3] 李晓曼,杨婧,涂文嘉. 非认知能力对中小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与政策启示[J]. 劳动经济评论,2019(2):133-148.
- [4] 程虹,李唐. 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效应[J]. 经济研究,2017(2):171-186.
- [5] 乐君杰,胡博文. 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2017(4):66-76+127.
- [6] 王春超,张承莎. 非认知能力与工资性收入[J]. 世界经济,2019(3):143-167.
- [7] 陈博欧,张锦华. 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J]. 财经研究,2021(11):124-138.
- [8] 朱志胜. 非认知能力与农民工城市创业回报——事实与机制[J]. 人口与经济,2021(3):18-34.
- [9] 梁宇亮,胡浩,江光辉. 性格决定命运: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及机制研究[J]. 西北人口,2021(2):15-26.
- [10] HECKMAN J. Integrating Personality Psychology into Economics[J]. NBER Working Paper,2011:1-35.
- [11] SARAH C. Heterogeneity and selection in the labor market[D]. Economics Department,University of Chicago,2011.
- [12] 盛卫燕,胡秋阳. 高端服务业发展与技能溢价:基于非认知能力的微观机理解析与实证检验[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6):80-97.
- [13] COSTA P,TERRACCUANO A,MCCRA R.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aits across cultures:Robust and surprising finding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2001(2):322-331.
- [14] WALKER A. The social quality approach:Bridging Asia and Europe[J]. Development and Society,2009(2):209-235.
- [15] 卢小君,韩愈. 中国城市社会包容水平测度:以48个城市为例[J]. 城市问题,2018(12):37-43.
- [16] 聂伟. 社会包容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2018(6):102-112.
- [17] 王建国,李实. 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水平高吗?[J]. 管理世界,2015(1):51-62.
- [18] COMBES P P,AYLVIE DEMURGER,SHI L. Urbanisation and migration externalities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3(2):43-86.
- [19] 李叶妍,王锐. 中国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146-154.
- [20] 何晓丽,王振宏,王克静. 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线索效应[J]. 心理学报,2011(12):1408-1417.
- [21] 聂伟,蔡培鹏. 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21(3):53-60.
- [22] NYPVIST F,FORSMAN A K,GIUNTOLI G. Social capital as a resource for mental well-being in older people:A systematic review[J]. Aging & Mental Health,2013(4):394-410.
- [23] WALKER A,WIGFIELD A. The social inclusion component of social quality:European network on 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J].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2004:112-133.
- [24] BESCOBD D,CHATAIGNIER A,MEHRAN F. Seven 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ent work: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2003,142(2):79-212.

- [25] 钱芳,陈东有,周小刚. 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体系的构建[J]. 江西社会科学,2013(9):189-192.
- [26] 聂伟. 就业质量、生活控制与农民工的获得感[J]. 中国人口科学,2019(2):27-39+126.
- [27] 张原. 农民工就业能力能否促进就业质量? [J]. 当代经济科学,2020(3):17-31.
- [28] 苏丽锋. 我国转型期各地就业质量的测算与决定机制研究[J]. 经济科学,2013(4):42-53.
- [29] LESCHKE J,WATT A. Challenges in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uropean job quality index[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4(1):1-31.
- [30] 明娟,王明亮. 初始就业状态,工作转换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变动[J]. 西部论坛,2016(2):1-13.
- [31] COSTA P,MCCRAE R. Four ways five factors are basic[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992(6):653-665.
- [32] MUELLER G,PLUG E.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male and female earnings [J].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2006(1):3-22.
- [33] BORGHANS L,DUCKWORTH A,HECKMAN J. The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trait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08(4):972-1059.
- [34] SEGAL C. Motivation, test scores and economic success[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Working Paper,2008.
- [35] HECKMAN J,RUBINSTEIN Y. The importance of noncognitive skills:Lessons from the GED testing program[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2):145-149.
- [36] 李涛,张文韬. 人格特征与股票投资[J]. 经济研究,2015(6):103-116.
- [37] 徐延辉,李志滨. 就业质量、城市社会包容与农民工健康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2-10+235.
- [38] 黄国英,谢宇. 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青年劳动收入回报的影响[J]. 中国青年研究,2017(2):56-64+97.
- [39] 邓睿. 社会资本动员中的关系资源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 [J]. 经济学动态,2020(1):52-68.
- [40] 卢海阳,杨龙,李宝值.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J]. 中国农村观察,2017(3):57-71.
- [41] 张吉鹏,卢冲.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J]. 经济学(季刊),2019(4):1509-1530.
- [42] NANDI A,NICOLETTI C. Explaining personality pay gaps in the UK[J]. Applied Economics,2014(25):3131-3150.
- [43] NORDMAN C J,SARR L,SHARMA S. Skill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gender wage gaps: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J]. WIDER Working Paper Series,2018(1):1-25.
- [44] KAUTZ T,HECKMAN J,DIRIS R. Fostering and measuring skills:Improving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to promote lifetime success[J]. IZA Discussion Paper,2014:86-96.

Non-cognitive Abil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the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Empirical Test Using the Data of Five Surveys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from 2010 to 2018

ZHOU Dan¹, LI Wu-rong¹, FANG Jin-ping²

(1. School of Busines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s soon as possibl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finement of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complexity of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have made non-cognitive ability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workers,

but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certain dimensions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or some aspects of employment quality,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mprehensive variables of migrant workers'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employment quality is even insufficient, and the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does not include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i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like other workers, the improv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non-cognitive ability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foreign labor force make social inclus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act that the increase of urban social tolerance wi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will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complexity and extroversion of the work engaged by migrant workers, the influential effect of individual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urban social tolerance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will also increase. On one h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volution of increasing work complexity and extraversi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increasing urban social toler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dividual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urban social tolerance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urban social tolerance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effect of non-cognitive abilities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job complexity and extrovers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onstructio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the three industries where migrant worker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have increased in turn, and thus the above effects also have increased sequentiall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five surveys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0 to 2018 confirms the above views. Individual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urban social tolera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social tolerance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se three positive effects all have a gradually increasing temporal trend, and they increase sequentially in the samples of constructio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inly expands and deepens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employment quality effect of workers' non-cognitive ability is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ree comprehensive variables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employment quality" and "social toleranc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three variables are included in the same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effect of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ocial tolerance. Secondly,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performed by migrant workers, the time trend and industry heterogeneity of the employment quality effec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social tolerance are explored.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improvemen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urban social tolerance in promoting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as well as its time trend and industry heterogeneity, which will help migrant workers, employer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take more a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social tolerance, thereby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and continuously promoting new urba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non-cognitive ability; urban social tolerance;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CLC number: F241; F323. 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2)02-0047-16

(编辑:黄依洁)